

【经济卷】

致经世之子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25周年精华集

主 编：郅 正 邵汉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 25 周年精华集【经济卷】

致经世之学

本卷主编 李 华

吉林人民出版社

致经世之学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 25 周年精华集[经济卷]

主 编:邴 正 邵汉明

责任编辑:翁立涛 封面设计:翁立涛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 - 5649710

印 刷: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3.5 字 数:3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 - 206 - 03319 - 9/G · 1400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 000 册 定 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顾 问

王慎荣	《社会科学战线》首任主编、研究员
关德富	《社会科学战线》二任主编、研究员
周惠泉	《社会科学战线》三任主编、研究员
赵鸣岐	《社会科学战线》四任主编、研究员

编委会

主 任:	邵汉明			
副 主 任:	王 卓	于德钧		
成 员:	尚永琪	马 妮	李 华	王永平
	王玉华	胡维革	李彦珍	翁立涛
	潘 锐	马 捷	陈家威	

战线无垠思无尽 博文添绿意添新

——为《社会科学战线丛书》序

郅 正

1978 年被后来的人们称之为“科学的春天”。在那一年的 3 月，我们做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走入了大学校园。不久，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同志在讲话中引用了白居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那真是一个春潮涌动，令人感慨万千的春天。

正是在这万象更新的“科学的春天”，我读到了刚刚问世的《社会科学战线》，她那厚重的学术风格，广博的学科领域，以及锐意创新、推动思想解放的探索精神，很快风靡校园，得到师生们的钟爱。也许就从那时起，我与《社会科学战线》结下了不解之缘。

25 年过去了。25 年来，人世沧桑，天地巨变。《社会科学战线》也走过了风风雨雨。也许是某种巧合吧，我由一名《社会科学战线》的读者，渐渐演变成作者，近年又转为编者的一员。常言说“渐行渐远”，我与《社会科学战线》，却“渐行渐近”，这也许就是“不解之缘”吧。

25 年来，《社会科学战线》究竟凭借着什么样的魅力，自立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众多的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之林呢？是她的名字吗？《社会科学战线》的名字明显带有时代的痕迹，并不那么时尚，更不那么新潮。是她那厚重的篇幅吗？遍览群刊，厚者如云，《社会科学战线》并非鸡群鹤立，能执牛耳。是她偏得天时地利吗？天时者，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早已四海同一了。说到地

利,《社会科学战线》地处北国边塞,既非京都繁华之地,也非花团锦绣之乡,而属于正待振兴的“老工业基地”!

读了《社会科学战线》25年来发表文章汇编而成的丛书,读者也许会参悟到其中的奥秘,从中领悟到《社会科学战线》两代编者的苦心追求。

作为学术期刊,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学术方向的同时,都要追求其学术性。至于何为学术性,诸子百家,其说不一。学术一般是指系统化、专门化的知识活动。学术性首先应该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社会科学战线》25年走过的道路,体现了两代编者一种严谨凝重、持之以恒的求真精神。求真易而执着难。真理需要一个发现过程,同样也需要一个被认识、接受的过程。真知灼见并非一经刊出就举世公认,欢声雷动。恰恰相反,真理的问世往往是曲折的,有争议的,甚至是沉寂的。炼丹须经九转火,选材要待七年时。这种甘耐寂寞、不畏俗论、执着探索、关注学术的风格,贯穿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读者也由此可见编者的良苦用心。

当然,要办好一本学术杂志,仅有执着的求真精神是不够的。杂志终究是给人看的。要让人看,就要有感染力,要能够紧紧抓住人心。学术的感染力在于学术的水准与敏锐性。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支撑一本杂志的灵魂,当是现时学术水准之作。25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刊发了许多大师之作,其中也有许多开风气之先之作。许多文章今日读来,仍可感到力透笔墨,气势磅礴,令人忆起那些虽消逝在时光之中,但存留在人心之内的时代风云。特别是一些大师今已做古,睹文思人,令人倍生感伤!

我是研究哲学的,深知哲学即是人学的道理。一本好杂志的灵魂,也是她的人气所在。好杂志是良师,是益友,是提携后学的桥梁,是以文会友的彩虹。25年来,《社会科学战线》陪伴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文友们同经风雨,走过了科学的春天,涉过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疾风暴雨,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学术争论和思想交锋。精神的磨砺,思想的交锋,在《社会科学

战线》的字里行间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擦痕，迸发过闪耀的火花。于今春华秋实，我们可喜地看到，许多大师曾在此心灵交会，一展笔墨春秋。更有一批莘莘学子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已成为今日文坛的先锋锐将。一览那些如今已蜚声天下的中青年专家的处女之作，可见当年一代风流成长的足迹，对今日的青年学者们，或许会更添几分启迪吧！

人生无涯，世界无限，一本小小的杂志是微不足道的。但滴水可以映日，一叶亦可知秋。读罢《社会科学战线》25年来走过的道路，也令我回忆了自己求学至今25年来的寒窗岁月，更忆及25年来国内学坛之风云际会。正可谓二十五载春露秋霜，几代学人革路蓝缕。多少华章妙笔生花，文采飞扬；多少睿智如风似火，开启心灵；多少才俊辉若群星，璀璨夺目。传大师薪火，展泰斗鸿音，襄助新秀，提携后学，以学术为本，开风气之先，当是《社会科学战线》追求之目标。

记得去岁《社会科学战线》举行创刊25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正在集安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驱车千里，翻山越岭，赶回长春参加庆典。时值十月仲秋，偏偏雪下得早，一路之上弥天飞雪，扬扬洒洒，而满山枫叶，如火如荼，银雪红叶，相映相辉。心中顿生诗兴。愿《社会科学战线》风格如深秋红叶，霜重色浓，激情似火；意境如初冬白雪，自由飘逸，冰清玉洁。

驱车千里过长白，
满途红叶胜花开。
无意秋霜山自老，
有情苍柏绿未衰。
斜风寒雨蔽深谷，
银雪紫枫映高崖。
天地茫茫知时冷，
飞絮万点报冬来。

2004年5月10日

战线无垠思无尽 博文添绿意添新

——为《社会科学战线丛书》序 邵 正

视角的调整

——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

- 反思 马家驹 (1)
- 美国宪法的经济学含义 张宇燕 (26)
- 试论经济学的内容、性质和功能 张曙光 (40)
- 过渡经济学：我们知道什么？ 张 军 (51)
- 经济学方法论 张五常 (74)
- 社会科学及制度经济学概论 汪丁丁 (90)
-
- 价值规律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关梦觉 (109)
- 关于计划价格形成的基础问题 张维达 (114)
- 国土建设与国土研究 于光远 (128)
- 固定资金的周转和管理 孙冶方 遗作 (150)
- 价格体系的“块间断续连动改革”与战略
- 起步 谷书堂 宋光茂 (178)
- 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与协调 厉以宁 (194)
- 论作为一种公共选择过程的体制改革 樊 纲 (209)
- 市场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中国
- 的经验 左大培 (223)

通货紧缩为何与经济增长并存? 林毅夫 (246)

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汉译本序 陈岱孙 (254)

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与土地制度

..... 邓拓 遗作 (258)

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六次革命 胡代光 (268)

论厂长(经理)负责制 王梦奎 (283)

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

问题与出路 张维迎 (305)

国有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的深层

次理论研究 蒋学模 (321)

国有企业的物质刺激与道德祸因之巧合

... [美国] H. G. 布罗德曼 [香港] 肖耿 (337)

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退出承接的新模式

——对“动态股权制”经验的思考

..... 纪玉山 李兵 李晓辉 (359)

个体私营经济与乡镇企业发展

——温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调查报告

..... 马健行 (371)

今日中国农民的利益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 李成贵 (383)

中国农民负担有多重

——农民负担数量及减负办法研究 胡书东 (400)

后记 (415)

视角的调整

——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反思

马家驹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原先就是从方法论的探讨入手的。现在我的反思自然也应该以此为起点。本文所要谈的，均属这一范围。

一、在坚持从“目的论”和“发生论”两个方面的统一上观察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提下，改变过去片面强调“目的论”方面的情况，更多地注意“发生论”方面

“目的论”（Teleology）和“发生论”（Genetics）是两个哲学概念，原来的含义是对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呈现为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与格局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解释。

按照“目的论”的观点，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体现着某种目的，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①显然，这是一种神学的或通向神学的观点。

反之，按照“发生论”的观点，则整个自然界和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结果，都经历了一个受客观规律支配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9页。

发生过程。天体的形成、地质的演变和生物的进化等等，莫不如此。这种观点的科学性，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了。

最初把两个概念借用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现象的，是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划的讨论。现在流亡瑞士的捷克经济学家奥·锡克也同当年的苏联经济学家一样，用“发生论”来表达经济计划的“客观决定的方面”，用“目的论”来表达经济计划的“符合愿望的方面”，如增长的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基金在各方面的分配，等等^①。

今天在有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中，这两个概念有时也被赋予另外的含义。例如，在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伊·马克西莫维奇的《公有制的理论基础》一书中，“发生论”指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的自发性，而“目的论”指的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自觉活动^②。

很清楚，在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那里，“目的论”都同所谓万能的“造物主”毫不相干，他们所说的目的都是指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活动的人的目的。而“发生论”则是指经济过程也和自然过程一样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这样一种性质。我现在同样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不过，我用它们来描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另外一些现象，至少是着眼的重点不同。如果说那些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涉及的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那么在我则首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

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就同时具有“目的论”和“发生论”两个方面的性质。或者说，现实存在的具有各种不同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包括根本制度和体制，它们的形成，都是“目的论”和“发生论”两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它们

① 奥·锡克：《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981年在我国访问期间的学术报告），《经济研究资料》1981年5月增刊。

② 伊·马克西莫维奇：《公有制的理论基础》，第88—89页。

今后的发展，也都离不开这两种因素的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像历史上存在过的其他社会经济制度那样是从旧社会的母胎中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人们自觉的活动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建设有一个确定的目标，那就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新社会及其两个阶级的经济特征的大致论述所构成的规范。尽管今天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论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即体制，都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那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形象（Image）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或者至少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都把逐步建立那样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当作自己的根本目标。而它们在各个不同阶段上就经济制度的建设所提出的具体任务、方案和计划等等又无非是作为逐步走向根本目标的措施和步骤，对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个阶段来说，本身又成为一种具体的目标。正是上述根本目标和为逐步实现这一根本目标而提出的一些具体目标，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强有力的“目的论”因素，规范着建设的进程^①。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产生和发展尽管是人们在自觉设定的目标指引下进行活动的结果，却也和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②。就是说，在这里，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规律同样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人们究竟能不能够或在多大

① 人类的活动从来是有目的性的，这一点不会因制度的不同而有差别。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人们各种各样的个人目的或局部的目的之上存在着一个代表全社会的自觉的目的，它体现在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计划之中，并且能够把亿万群众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组织起来朝着一个统一的目标前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目的论”因素的强大作用看作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程度上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归根到底也要取决于这些目标是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取决于在客观上是不是已经存在着实现这些目标的一切必要条件，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以及它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怎样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条件不具备时，人们希望建立的关系未必建立得起来或者勉强建立了也不能促进，相反地倒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人们主观上想要废除的关系又未必废除得了或者勉强废除了也会造成许多恶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也不例外。

“目的论”和“发生论”两个方面的关系，不言而喻也就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这种一般关系存在。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这个问题上，上述一般关系有它特殊的表现。我以为，在这里借用“目的论”和“发生论”这两个概念来表达，是十分恰当的。

从原则上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目的论”和“发生论”这两个方面的性质或因素应该是统一的。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不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理性和社会主义终将战胜愚昧和邪恶的信念上，不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去凭空设计一个理想的境界；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必将灭亡而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并且仅仅在科学的推论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于前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景作了简单的提示。

但是具体来讲，问题就远不是那样简单。回顾一下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各个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无论在哪里都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一个像数学上的“迭代法”那样在单一方向上朝着根本目标渐次逼进的过程，而是一个总的说来虽然沿着一定的方向前进但在其间充满着局部的挫折、暂时的后退、具体标向的调整、一度实施过的这样那样的方案的修改甚至废弃和新的方案的制定，以及种种偶然性的过程。在这当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设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走过不少弯路，承受了不容低估的损失。直到今天，不仅我国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进行、正在进行或者开始酝酿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恰恰表明了前进过程的这种曲折复杂的特点。这些情况，有的是同形势与条件的变化有关，同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成长有关。具体制度上某些方面的改变，并不等于说先前的就一定错了，而常常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必须承认，也有许多情况确实反映着“目的论”因素同“发生论”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是说人们在不同时期为不同方面设定的目标本身发生了偏差，因而遇到困难，产生了消极的乃至破坏性的后果，以致不得不做出调整。

这种矛盾与冲突的产生，是不难理解的。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虽然无可辩驳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也决不愿意在事先去设计新社会的细节，而只能揭示一个比较抽象、简单甚至有几分朦胧的目标。至于这个目标最后如何实现以及实现在怎样一种具体形态之中，那要由后人在实践中加以解决。这种实践带有极大的探索和试验的性质，尽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作指导，也不能保证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提出的各项任务，设定的各种具体目标和采取的一切步骤，都能符合于客观的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自身成长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失误总是

不能完全避免的。

其次，作为根本的目标或者说至少从主要方面规范着根本目标的东西，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方面勾划出来的那个大致轮廓本身，总的说来无疑是科学的，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缺陷。他们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共同体，人们在全社会范围的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共同占有产品并统一地按劳动分配消费品，因而从根本上废除了商品生产。这一点不仅已经被迄今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仔细推敲起来还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不复存在作出充分的论证，至少是没有一一列举出为做到这一点所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满足又要求什么条件。比方说，撇开人们特殊的利益关系不谈，单从经济运行机制的技术方面来看，要做到由社会统一地直接按分配劳动和其他各种资源以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形形色色和不断变化的种种需要，并且准确无误地把千万种产品直接分配到恰恰需要它们的地方，其所要求的信息系统将是一种何等巨大、何等复杂和具有何等效率的系统呢？这些都是不清楚的。事实上，在我们今天展望未来的视野所及的范围内，还远远看不到用这样一种完全依靠直接的手段调节资源与产品分配的经济代替商品经济的前景。通过实践，人们倒是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只有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组织起来才能有效率地运行和健康地成长，而它的计划性也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排除了商品生产的存在这一点，在过去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把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度考虑直接过渡到完全废除商品、货币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情况作为特殊的例外，就是在商品生产的存在得到理论上的承认的情况下，也常常是把它视为异己的东西，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商品生产的消亡仍然被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成熟与完善的标志。当然，这主要还是如何

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遗产的问题，而不能归咎于 100 年前的两位伟大的导师，因为他们从来不想在有关新社会的建设问题上用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束缚后人的手脚。

再次，与上面这一点相联系，导致“目的论”因素与“发生论”因素相矛盾和冲突的另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人们不仅在对根本目标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够清醒和恰当的地方，而且在前进的过程中还常常表现出急于求成的倾向，以致做出像古代寓言中所讲的“揠苗助长”那样的事情。例如在我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基本上是依靠行政命令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之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并且几乎完全取消了个体所有制。而对于集体所有制又搞不断升级，追求所谓“一大二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把财产归大堆、干活大呼隆、劳动不记工分、吃饭不要钱这样一套荒唐的作法当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结果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损失，到头来还不得不退回去。其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所有制本来是公有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凡是能够由劳动者个人独立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特别是这种独立的个体生产和经营能够显示其独特的适应性和优越性的，都应该鼓励个人去干，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再进一步说，由于规模经济的要求，这种个体经济除了走向联合和合作化之外，也会从中产生某些雇工经营的情况。后者，只要有利于活跃经济，满足社会需要，也应该允许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它的初级阶段，要实现清一色的公有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则是客观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成长过程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然的现象。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认识的获得，曾经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最后还有一个导致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原因，那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固然就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来说应该是在统一的目标指引下进行的自觉活动，但是这种自觉性不可能也不必要

把一切都囊括无余。并且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目标的选择也应该同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相结合，因此还必须给经济制度形成中的某些自发的、自行组织的活动留有余地。比方说，如果正确地允许个体所有制的存在，就像今天我们已经做的这样，那么它在经济形式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包括各种方式的联合和真正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化等等，就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体现着“发生论”的要求。对此应该密切注意观察，及时总结经验，给予必要的引导、调节和择优加以提倡，而不能横加干涉，强行“促进”，硬把它们塞进某些框框里去。又如，既然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那么市场本身的发育成长也必然带有自行组织的性质，而不能完全依靠事先拟定的条例一蹴而就地“制造”出一个完善的市场来。但是，在我们过去的实践中，可以说谈“自发”而色变，凡是带有自发性的现象统统视为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必欲铲除之而后快。正是在这里“目的论”的因素也同“发生论”的因素发生剧烈的冲突，一方面经济发展中某些富于活力的因素被窒息，另方面虽然自觉但十分勉强地建立和维持的某些具体制度又了无生气，实际上起着阻碍的作用。

从最终的结果上看，“目的论”因素和“发生论”因素迟早总会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清醒起来，从而自觉地修正先前选择和设定的某些不恰当的目标。如果说这表明“发生论”因素对“目的论”因素的一种根本的制约，那么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各种条件的聚合下，一些具有偏差甚至是很大偏差的目标，只要还没有被人们认识清楚，它们作为过程中的“目的论”因素就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顽强地存在着。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性质因而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能够长期维持下来（在我国是将近30年，在苏联如果从实现全盘集体化和所谓斯大林模式的体制全面建立算起则已超过50年），就是一个例证。可见，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使“目的论”因素和“发生论”因素在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具体地统一起来，